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基于结构性减税的视角

甘家武, 李建军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昆明, 650221;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我国于2009年将结构性减税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而这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着争论。文章利用1978—2010年的数据, 通过时间序列的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及脉冲响应技术方法, 对税收规模及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在短期, 税收规模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 但从长期来看, 所得税、流转税及税收总规模的增长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 结构性减税; 所得税; 流转税; 税收水平; 税收收入;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029-06

2009年1月5日,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 2009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是: 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可见, 结构性减税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主基调。事实上, 减税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由于当时有效需求的不足, 因此凯恩斯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以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财税政策。他主张国家通过干预收入分配和促进收入均等化, 以此提高消费倾向, 同时主张政府加强对投资的控制, 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这种以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政策实施, 提高了社会有效需求水平, 对实现充分就业并增加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面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滞胀”现象,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供给学派提出通过减税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 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 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提出以减税来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 增加社会总供给的供给学派, 最终达到刺激经济稳步增长的目的。西方国家所实行的“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政策, 使得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由于减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 我国很多学者希望通过减税政策克服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对于结构性减税, 理论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目前, 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① 结构性减税是指税种上

的有增有减, 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总体上得到减轻^[1]; ② 结构性减税是指税种上的有增有减, 以减为主, 但税收收入总体上应保持上升趋势^[2]; ③ 结构性减税是指税种上的有增有减, 总体上具有减税效应, 但政府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3]。笔者认为, 税负水平和税收收入两个变量并不是独立变量, 税负水平的高低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减, 更多取决于国家政策意图。这种结构性减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本文试图探讨我国各税种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 并为我国结构性减税提供政策建议。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是引言, 提出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 梳理目前税收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理论现状, 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实证及结果与分析; 最后是全文总结及建议。

一、文献回顾

税收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税收和政府开支可能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激励, 进而影响经济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方面。但是, 对于某些变量的影响方向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因此, 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 更高的税收毫无疑问会导致低

收稿日期: 2012-12-29; 修回日期: 2013-07-16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2011Z078);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QN201108)

作者简介: 甘家武(1981-), 男, 湖南岳阳人,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云南财经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财税理论与政策。

的增长率。该观点认为,通过征税增加财政收入会扭曲投资和储蓄。Ihori(2001)利用两种财富类型(生命周期财富和转移财富)和两种资本类型(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证明了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对遗赠和消费征税会减少投资和经济增长^[4]。马拴友(2001)根据我国1985—1999年统计资料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5]。郭庆旺(2002)通过对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认为在不考虑财政支出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连年超长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6]。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某些税收政策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Baier和Glomm, 2001: 2008)^[7]。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的是,该观点不是单独考虑税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是同时结合了财政政策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这些发生在政府旨在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马路,公路,机场)会吸引私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Capolupo(2000)^[8]在Barro(1990)^[9]和Lucas(1990)^[10]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同时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须对产出征税,认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1996)^[11]、Yakita(2003)^[12]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Turnovsky(1996)的研究也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效应^[13]。

第三种观点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Hendricks(1999, 2001)证明了与人力资本新古典增长模型比较,税收改革的经济增长影响更小或者对参数的选择的更不敏感,并且与经验可能的参数值相符合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范围非常广。他通过假定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是可以扣税的,发现对于参数的变化所有模型规格都很小,并且对于参数的变化都很稳定。如果投入不扣税,在无限期的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若干隐含的假设条件。^①[14-15]Kneller等(1999)利用22个OECD成员国家1970—1995年期间的数据分析发现,非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影响^[16]。

根据传统的凯恩斯理论,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是消极的。但是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不同的研究者所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因为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实际暗含着一前提假设条件,即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的税收为总税收,并没有考虑单个税种或税种之间的结构变化;第二,传统的凯恩斯乘数效应理论把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看作是相互独

立的变量,实际上两者之间并非独立,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②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实际上可以分为扭曲性税收和非扭曲性税收。扭曲性税收通过改变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非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就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 指标和数据说明

在指标选择上,由于财产税和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小,故本文并没有考察财产税和资源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只选择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税收总收入(tax)、增值税(vat)、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pit)、消费税(ct)和营业税(bt)八个变量。但是考察协整关系的过程中,控制变量个数太多而样本量太小,损耗过多自由度,出现了奇异矩阵的问题。另外,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因此本文只考虑1985—2010年所得税、流转税和税收总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在数据上,为消除物价因素影响且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又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本文所有变量都以1985年为基期经平减处理,同时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各变量取对数,即lngdp、lntax、lnit和lntt分别表示对数化的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总收入、所得税额、流转税额。文中所使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总收入、流转税、所得税的协整关系之前,首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四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表1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四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

(三) 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

虽然序列lngdp、lntax、lnit和lntt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时间序列,这些序列的矩,如均值、方差和协方差随时间而变化,但是这些序列的线性组合序列却有可能不随时间变化的性质,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cointegration)。本文使用Johansen(1995)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 and 协整检验。^③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表 1 各向量及其差分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	ADF	临界值	检验形式	结论	变量	ADF	临界值	检验形式	结论
lngdp	-3.96	-4.44***	(C,T,1)	不稳定	Δlngdp	-4.29	-3.64**	(C,T,1)	平稳
lntax	-2.21	-3.25***	(C,T,0)	不稳定	Δlntax	-4.12	-3.63**	(C,T,0)	平稳
lnit	-1.07	-3.25***	(C,T,0)	不稳定	Δlnit	-3.58	-3.26***	(C,T,0)	平稳
lntt	0.05	-3.26***	(C,T,2)	不稳定	Δlntt	-4.23	-3.64**	(C,T,1)	平稳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水平; 临界值由 Eviews6.0 软件给出; ADF 检验形式, 其中 C 和 T 表示时间序列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趋势项由 Fuller(1976)中给出的 t 临界值来确定, K 为滞后阶数, 根据 AIC 和 SC 值最小准则确定。

(VAR)检验方法, 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 必须先确定 VAR 模型的结构, 即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

首先, 假定两个列向量 X_{1t} 和 X_{2t} , 其中 X_{1t} 由 lngdpt、lntaxt 构成, X_{2t} 由 lngdpt、lnitt、lnttt 构成, 进行 VAR 模型的设定。在确定模型滞后阶数的时候, 为了保证合理的自由度, 同时使滞后阶数足够大, 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 本文使用赤池(Akaike)信息准则(AIC)、施瓦茨(Schwartz)准则(SC)和 LR 统计量检验标准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采用自相关 Q 统计量、LM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 同时采用 JB(Jra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

经检验, 我们发现列向量 X_{1t} 和 X_{2t} 的滞后阶数为 2 时, VAR 模型整体以及各自方程拟合效果较好, 残差序列较为平稳, 同时不存在自相关, 并且残差服从正态分布。因此, 我们确定 X_{1t} 和 X_{2t} 的最优模型为 VAR(2)。由于协整检验是无约束 VAR 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的 VAR 模型, 是无约束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 因此协整检验 X_{1t} 和 X_{2t} 的 VAR 模型滞后期为 1。

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总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与所得税、流转税的 Jonansen 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总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与所得税、流转税两系统都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有 0 个协整关系, 同时在 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有至少有 1 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r=0^*$	0.673 645	29.374 75	20.261 84	0.002 1
$r\leq 1$	0.145 633	3.620 060	9.164 546	0.471 6

注: “*”表示在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检验形式采取序列和协整方程都有线性趋势; 临界值由 Eviews6.0 软件给出; “***”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 p 值。

表 3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r=0^*$	0.677 968	53.367 99	35.192 75	0.000 2
$r\leq 1$	0.626 515	27.306 61	20.261 84	0.004 5
$r\leq 2$	0.183 205	4.654 439	9.164 546	0.323 4

注: 同表 2。

$$ec_{1t} = \ln gdp_t - 0.413\ 58 \ln tax_t - \frac{6.185\ 7}{\begin{matrix} (0.020\ 30) \\ [-20.369\ 8] \end{matrix}} \quad (1)$$

$$\text{Log likelihood}=85.320$$

$$ec_{1t} = \ln gdp_t - 0.319\ 63 \ln it_t - 0.147\ 54 \ln tt_t - \frac{6.832\ 8}{\begin{matrix} (0.017\ 79) \\ [-12.343\ 9] \end{matrix}} - \frac{6.832\ 8}{\begin{matrix} (0.020\ 04) \\ [-7.363\ 8] \end{matrix}} - \frac{6.832\ 8}{\begin{matrix} (0.101\ 21) \\ [-40.267\ 7] \end{matrix}} \quad (2)$$

$$\text{Log likelihood}=87.377$$

两式中, 小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中括号内为 t 值。从式(1)和(2)可知,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在长期, 税收收入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成正向关系, 税收收入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相应的约增加 0.41 个百分点; 由式(2)可知, 在长期内, 所得税收入额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将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 0.32 个百分点, 流转税收入额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国内生产总值将相应提高约 0.15 个百分点。由此可知, 虽然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 狭义宏观税负不断提高, 但从长期来看, 税收并未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反而整体上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 不过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来自于所得税, 而流转税相对于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弱。

(四) 误差修正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

以上协整检验说明, 税收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间, 所得税、流转税与国内生产总值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内, 这种均衡关系的过程如何, 需要进一步实证验证。根据 Granger 定理, 可以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特征。由于 VECM 的滞后期是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 前面确定的无约束的税收总

额与社会总产出 VAR 模型, 所得税、流转税都与社会总产出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都为 3, 故两者的 VEC 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2。税收及其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两 VEC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Delta \ln gdp_t = c_1 + \alpha_{1t} \Delta \ln gdp_{t-1} + \beta_{1t} \Delta \ln tit_{t-1} + \lambda_{1t} \cdot ec_{t-1} + \varepsilon_{1t} \quad (3)$$

$$\Delta \ln gdp_t = c_2 + \alpha_{2t} \Delta \ln gdp_{t-1} + \beta_{2t} \Delta \ln it_{t-1} + \gamma_{2t} \Delta \ln tt_{t-1} + \lambda_{2t} \cdot ec_{t-1} + \varepsilon_{2t} \quad (4)$$

两式中 ec_{t-1} 为误差修正项, 分别等于式(1)和(2), λ_i 为系统的调整系数, 包含着变量过去值对现在值影响的信息, 反映系统从失衡向均衡的调整速度。两 VEC 模型估计结果如式(5)和(6):

$$\begin{aligned} \Delta \ln gdp = & -0.3398 \ln ec(-1) + 0.60924 \Delta \ln gdp(-1) - \\ & \quad [-4.7887] \quad [4.0614] \\ & 0.29861 \Delta \ln tax(-1) \quad (5) \\ & \quad [-2.8501] \end{aligned}$$

$$R\text{-squared}=0.6818; F\text{-statistic}=21.43$$

$$\begin{aligned} \Delta \ln gdp = & -0.4211 \ln ec(-1) + 0.79732 \Delta \ln gdp(-1) + \\ & \quad [-3.1729] \quad [5.0779] \\ & 0.03671 \Delta \ln it(-1) - 0.02315 \Delta \ln tt(-1) \quad (6) \\ & \quad [1.0206] \quad [-0.4266] \end{aligned}$$

$$R\text{-squared}=0.61444; F\text{-statistic}=10.093$$

式(5)VECM 残差序列的 LM 统计量为 7.418 ($P=0.5936$), White 检验统计量为 24.455 ($P=0.6050$), 说明 VECM 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 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模型调整系数 EC 为 -0.3398 符合逆向调整原理, 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为 33.98%, 对失衡调整的速度较快。从式(5)回归系数来看, $\Delta \ln tax(-1)$ 的系数为 -0.2986 且显著, 说明在短期税收总收入的增加为降低社会总产出。式(6)VECM 残差序列的 LM 统计量为 5.8536 ($P=0.2104$), White 检验统计量为 54.47 ($P=0.2416$), 说明 VECM 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模型调整系数 EC 为 -0.4211, 符合逆向调整原理, 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为 42.11%, 对失衡调整的速度比较快。从式(6)的回归系数看, $\Delta \ln it(-1)$ 和 $\Delta \ln tt(-1)$ 的系数分别正和负, 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在短期所得税和流转税对社会总产出及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

为进一步探求税收规模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轨迹, 文章采用脉冲响应技术来进行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内生变量对随机扰动的动态反应过程, 显示某一变量的随机扰动(innovation 新息)通过模型

影响其他变量的变动轨迹, 能直观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效应。基于 VECM 的税收规模及结构对国内生产总值影响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由图可知, 税收总收入一个信息(innovation)的冲击, 在前三期之前对经济产出影响为负, 其后逐步转为正且对经济产出的促进左右持续增强; 所得税一个信息的冲击在初始对经济产出的作用为正, 但比较弱, 其后冲击作用持续增强; 流转税一个信息的冲击在前三期对经济产出具有弱的负向作用, 其后冲击作用转为正, 但总体作用相对所得税较小。整体来看, 基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与前文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的结论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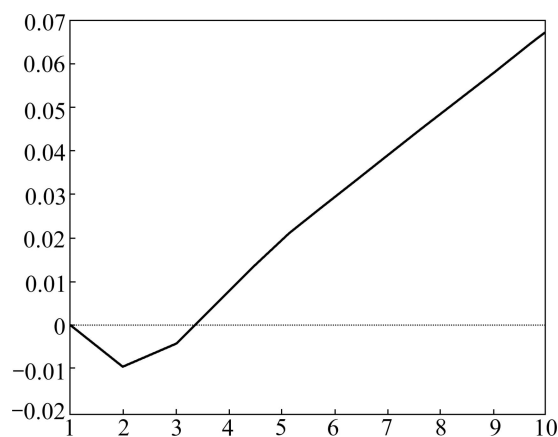


图 1 $\ln gdp$ 对 $\ln tax$ 冲击的反应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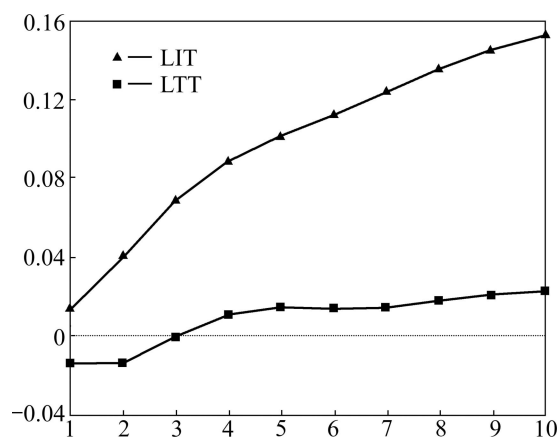


图 2 $\ln gdp$ 对 $\ln it$ 和 $\ln tt$ 冲击的反应轨迹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技术, 研究了税收总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 所得税、流转税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关系。根据检验结果,

发现税收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内,无论是所得税、流转税,还是税收总税收的增长都能促进社会总产和经济增长,其中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优于流转税的促进效应。而短期内,所得税和流转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分别为正和负,但作用不明显,整体上税收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的高速持续增长,不仅说明了税收调整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同时也为税收调整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建议:

(一) 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对增值税来说,征收范围越大,增值税的中性化特征就越明显,对经济的扭曲就越小。^[17]把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商品和劳务,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现代增值税制度。首先,将与工业生产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如采矿业、能源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制造业、邮电通讯业等。其次,将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合并,调整为统一的增值税,改变目前商品劳务税税制多和税种并列的现状,达到简化税制的目的;最后,降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

(二) 改革个人所得税

目前我国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调节效应十分弱化,甚至存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19]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一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计征模式,会使收入渠道多样化、应税所得总额较大但分属各税目的纳税人税负相对较轻,而收入渠道单一、应税所得额较小且只隶属单一税目的纳税人税负相对较重,难以真正实现税负公平;二是对于“工资、薪金所得”税目所采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言,税率级次过多,这与“简化税率结构、降低税收负担”“的趋势是不符的。因此,建议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类综合所得税”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由现行分类税制向分类与综合税制相结合过渡,按年课征的综合税制发展,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分配公平的实现。

(三) 改革消费税

消费税是一个具有较强调控能力的税种,通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可以达到扩大消费需求、保护环境和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建议:1、减征或停征一些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的税目,同时停征一些少数

生产资料的征税,如工业酒精、汽车轮胎等;2、提高危害环境与健康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税税率;3、扩大征税范围,将尚未列入消费税税目的具有危害环境的物品、奢侈品、资源稀缺品、高档消费娱乐等纳入征税范围。

(四) 改革房地产税

改革房地产税,主要包括:1、清理房地产行业的各种收费,取缔不合理、不合法性质的收费项目,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外负担;2、将现行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以及相关收费合并开征统一的房产税,以减化税制、优化结构;3、新的房地产税应按市场价值和实际价值、采用差别税率,从价计征。考虑到我国现行房地产税率、各年度各地方财政收入需要、纳税人负担能力以及改革之初的各种阻力等因素,建议采用较低的房产税税率。

注释:

- [1] Hendricks(1999)同时也承认,尽管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率有很小的影响(因为扣税),但是对人力资本积累导致一种直接扭曲刺激的税收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 [2] 政府支出和税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反馈机制,即支出和税收的扩张都会导致对方随之增长,任意一方的削减也都会减小政府规模。见 Musgrave, R. "Principles of Budget Determination" in H. Cameron and W. Henderson eds, Public Finance: Selected Readings, 1966.
- [3] See Johansen, S. Likelihood-based Inference in Cointegration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参考文献:

- [1] 高培勇. 结构性减税: 2009 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 涉外税务, 2009(1): 5-7.
- [2]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 关于当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若干政策建议[J]. 涉外税务, 2009(4): 5-8.
- [3] 李敏. 新一轮税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分析[J]. 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1): 16-17.
- [4] Ihori T. Wealth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4: 26-57.
- [5] 马拴友. 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兼论我国的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7): 15-20.
- [6] 郭庆旺, 吕冰洋. 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8): 18-23.
- [7] Baier S L, Glomm G. Long-run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public policies with distortionary tax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1, 25: 2007-2042.

- [8] Capolupo R. Output tax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1, 68: 166–183.
- [9]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103–125.
- [10] Lucas R E Jr.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 92–96.
- [11] Uhlig Harald, Yanagawa Noriyuki. Increasing the capital income tax may lead to faster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40: 1521–1540.
- [12] Yakita A. Taxation and growth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 467–487.
- [13] Turnovsky. Fiscal policy,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0: 41–66.
- [14] Hendricks L. Taxation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9, 43: 411–434.
- [15] Hendricks L. Growth, death, and taxe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1, 4: 26–57.
- [16] Kneller R, Bleaney M F, Gemmell N.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9, 74: 171–190.
- [17] 董其文. 加快推进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J]. 税务研究, 2010(11): 25–28.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GAN Jiawu, LI Jianjun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our country resorted to the policy of structural tax reducing to deal with it. However, there is a debate on how can the structural tax reducing influenc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data of 1978—2009, the authors tested the influence of tax size and structure to economic growth with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ime series and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ing the tax revenue is not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the income tax, turnover tax and tax size can be beneficial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Income Tax; Turnover Tax; Tax Level; Tax Revenue; Economic Growth

[编辑: 汪晓]